

“西諦藏書題跋”讀后感

朱家驊

近一年來，由於整理“西諦藏書”，有機會把鄭先生散在群書裏面的題跋讀了一部分。做為一個圖書館工作者，讀了以後，對我有着很大的启发。

首先給我的深刻印象，就是鄭先生對於古代文獻搜集整理所付出的辛勤勞動，鄭先生自己所謂“好書成癖”，那種盛旺的精神，四十年如一日，是令人不勝欽佩的。鄭先生為了訪書，走遍了南北各地。我們從“玉簪記”和“錄鬼簿”兩跋中可以看到，鄭先生為了訪問天一閣，不惜跋涉長途，為了抄一部暫時不能到手的重要資料，可以徹夜不眠。而在上海、北京居住的時候，“到書店去”幾乎成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。我們看他的題跋里提到，即使在事務繁忙的時候，他在工作完了以後還要到書店去看看，休息的日子更不用說。因此，他就非常熟悉書店的情況，甲書店從廣東來了一批什麼書，乙書店從山西來了一批什麼書，他能夠了如指掌。因此，他就能有更多的機會選擇他所需要的書。

每一部書，收進來以後，他也從不輕輕放過，查對卷頁，校正異同，都是他自己的事。每一部書到了鄭先生的手裏，不但要解決這一部書的問題，而且要从這一部書上面發現的材料來解決別的书的問題。得到一部比較好的書，經常要工作到深夜，我們從上文摘錄的三十則跋語中，不難看到這些事實。

第二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鄭先生對於殘書的收集。“西諦藏書”裏面，精旧罕見的珍貴資料固然很多，但是斷簡殘編也有不少，還有許多殘書甚至重復到兩部或三部，而且非常殘破，在整理的時候，真有點頭痛。但是讀了“南北宮詞紀”的題跋以後，使我很受感動。過去只知道鄭先生有一部初印完整的明刻本“南北宮詞紀”，是西諦曲藏中的頭目，非常珍秘。但是，鄭先生怎樣得到這一部珍貴的秘籍呢？在我讀了這部書的題跋以後，才知道這部書的來歷。它是積累了八部殘本，又從這八部中選出三部初印的拼湊起來的。在拼湊的時候，不但配殘卷，而且要配殘頁，正如鄭先生說的：“這

百衲衣似的“南北宮詞紀”就是這樣“成為一部完整無缺的本子了”。我翻開這部書，看看鄭先生所指出的配起來的殘頁，紙張墨色完全一樣，絲毫也看不出拼湊的痕迹，足見鄭先生在這部書上用心之深。如果鄭先生沒有留下這段題跋，我們怎麼會知道這樣一部初印完整的明代散曲名著能夠保存下來，卻有这么一段艱辛的過程呢？“西諦藏書”中由殘本配補而成的，並非只此一個獨特的例子。僅僅從我們摘錄出來的二十八則題跋中所提到的書，就還有“夷門廣牘”、“素園石譜”、“國雅”（見“釣台集”題跋）、“唐書志傳”等四種，而且“素園石譜”、“唐書志傳”兩種書所配補的本子，原來就是一部書，離而复合。從這一點看來，鄭先生搜集殘書工作，對古籍整理的貢獻，是不可忽視的。

當然，“西諦藏書”中還有更多的殘書沒有配齊，不過這些沒有配齊的殘書，也有鄭先生的心血在裏面。“代言選”一書的跋語中，鄭先生順筆提到“時方集數殘本‘石倉’”、“大明一統志”細細查對，尚缺十餘套，未見成一全書，殊為悶損，而夜已深矣”。鄭先生所說的“石倉”，就是明代曹學銓編的“石倉詩選”，在另一題跋中也談到“石倉詩選”余求之二十餘年，尚未得其全”。我館今天把鄭先生這項藏書接受下來，我們作採訪工作的人，應當把這部書配全，才算對得起鄭先生。

第三，鄭先生對於圖書資料的收集，常常是像鄭先生自己所說的“人棄我取”。但是，許多埋沒很久、無人過問的書，經過鄭先生的品題，頓時顯示出它的價值和作用。上面摘錄的題跋中所談的“乾隆縉紳全書”，就是一個例子。這種“縉紳全書”一般看來，不過是記載當時職官姓名，參考價值不大；但是鄭先生卻發掘了它在清代經濟上的參考價值。又如鄭先生所收新鐫赤心子匯編“四民利觀翰府錦囊”一書，看起來不過是“尺牘大全”之類的擴大，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，而事實上裏面却蘊藏着明代的風俗習慣的資料。可見鄭先生每收一類書，都有一定的打算，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見識深遠。

（下轉第12頁）

六、清代詩文集

鄭先生收清人文集較晚。他在所編“清代文集目錄”序文中說：“收書始於詞曲、小說及書目，繼而致力於版畫，遂廣羅凡有插圖之書，最後乃動博取清代文集之念”。當時鄭先生選的标准是只收文集不收詩集，他重視清代文集有兩點理由：第一，重視史料；第二，重其考訂經子金石文字之作。他在清代文集里面還着重收嘉道兩朝朴學家的文集。今天檢閱“西諦藏書”中，文集已超過千部，但詩集也有不少，可見建國以後，範圍又有所放寬。

七、魏晉六朝及唐人詩文集

鄭先生在建國以後方才動手收集魏晉六朝及唐人詩文集。他對六朝及唐詩的研究，是有着宏偉的規劃的。鄭先生曾說：“研討唐詩刻本是一大學問，非廣搜異本，多集資料，不易有可靠的總論”。（見“高常侍集”跋語）由於鄭先生的銳意經營，幾年以來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。明代匯刻六朝人的集子如汪世賢、張燮、張溥、薛應旂諸刻，都已具備。“玉台新詠”也收有前人目錄所未載的嘉靖仿宋本。“西諦藏書”中宋元本很少，而“陶集”却收有宋本。“蔡中郎集”則有徐子器本、余汝成本和茅一相本。唐人詩文集集中的初盛中晚各期名家，約略具備，其中也不乏善本。當然，鄭先生在這方面的收藏，雖然已經奠定基礎，但還有待於繼續充實。如果鄭先生不死，它的发展是能够想像的。

（上接第15頁）

第四，鄭先生在甄選圖書時，目光是那样的敏銳，識見是那样的果斷。看他的題跋中所談，書店每到一批書，他都能迅速地從里面選出較好的書。往往在亂書堆中，得到極不經見的版本。如他在明萬曆本“唐入選唐詩六種”的題跋中說：“此書雜皮亂書堆中久無人過問，一旦脫穎而出，大是慶幸”。這一方面說明鄭先生在得一本好書以後的喜悅心情，一方面也更說明他對古籍的鑒別能力。

鄭先生遇到好書，往往能够很快地作出決定，毫不猶疑。如“紡授堂集”的題跋中說：“帶經堂從福建購來，我一見即收之，故價乃奇昂”。“天章匯錄”的題跋中說：“是活字本，甚罕見，予翻閱一過，即挾之以歸”。“玉台新詠”的題跋中說：“帶經堂

八、明清史料

鄭先生對於明代史料的搜集，也很注意。如明藍格抄本“孤樹哀談”，是研究明初歷史的重要文獻。明刻本“歸德府寧陵縣士民疾苦條陳”，是反映明末農民遭受殘酷剝削的真實紀錄。明刻本“長安客話”是考証北京歷史的罕見資料。十餘年來，鄭先生收集的明代叢書里面，也蘊藏着不少史料。另外，“西諦藏書”中還有不少坊間編刻的日用小叢書，如明雅堂刻黑口本赤心子匯編“四民利觀翰府錦囊”、萬曆本鼎鐫十二方家參訂“萬事不求人博考全編”等類型的書，鄭先生也是準備“作一綜合研究”的。

清代史料的收集，鄭先生的目的是“收其較罕見及記述較確實者”（見“劫中得書記”八十四“請纓日記”跋語）。“西諦藏書”中，關於鴉片戰爭、中法戰爭、中日戰爭、義和團運動的資料，都有所獲。此外，在近代文化史上，也收得極可珍貴的資料，如道光刻本“日月刻度通書”，是僅見的第一部中西合璧曆書；又如咸豐七年上海墨海書館鉛印本“六合叢談”，是西洋印刷術傳入我國後現存最早的一部鉛印書。其他如咸同年間倡導西學的通俗科學譯著，也是我們研究西學東漸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除上面分別介紹的各種藏書以外，其他如宋元明清各代的詞集、各家書目、明清叢書等，在“西諦藏書”中亦均占有一定的地位。此外，鄭先生還非常注意明清兩朝活字版的收集，罕見的本子也不在少數。總之，“西諦藏書”的特點很多，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研究，這篇文章只是就涉獵所及，初步地加以概括報道而已。

廣東購書數百種，中有此書，予一見即收之，雖缺……無傷”。“石倉文選”的題跋中說：“來熏閣從鄧大酉山房林集處得之，一見即驚為秘笈，亟挾之而歸”。這些例子都說明鄭先生的卓識定見。我覺得這是我們圖書館從事採訪工作的人所應該深刻體會的。鄭先生懂得这么多的東西，有這樣豐富的知識，並不是什麼神奇的事情。而主要是由於他對學術領域的接觸一天的比一天廣，對目錄學的知識一天比一天深，對版本的辨別能力一天比一天高，所以一見好書，就能當機立斷。我們作圖書館工作的人，今天有很好的條件，如果自己不勤學苦練，年復一年，依然故我，而空嘆水平不夠，這是不能諒解的。我自己就是這樣一個類型的人，讀了“西諦藏書題跋”，給我增加了奮鬥的力量。